

“双一流”建设下高校社会成本共担研究 ——中美大学教育基金会比较

潜 力

(江西财经大学 金融学院 江西 南昌 330013)

摘要: 解决高校办学经费不足问题,离不开社会成本的共担。对比研究中美大学教育基金会在捐赠体系、管理模式、筹资结构和投资绩效等各方面的表现,发现我国高校教育基金会存在着体系不完善、管理不够专业、资产规模小、融资结构不合理、投资业绩弱、投入少、税收优惠不足等问题。这都严重阻碍了基金会内生动力的释放,抑制其对于“双一流”建设的支撑作用。因此,有必要借鉴美国一流高校的先进经验,并结合我国国情,完善我国大学教育基金会的管理体系,建立长效募捐激励机制,提升管理人员专业化水平,创新募捐模式,提升基金投资运作绩效,更好地为大学的“双一流”建设助力。

关键词: “双一流”建设; 社会成本共担; 高校教育基金会; 投融资策略

中图分类号: G64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 - 0098(2019) 05 - 0061 - 08

一、引言

伴随着 2015 年国务院印发“统筹推进高校双一流建设的总体方案”,以及一流大学、一流学科的建设名单的公布,引发了我国高校的新一轮竞争。各学校为了提升排名,在人才引进、师资培养、招生就业、科研教学奖励等方面都加大激励力度,从而导致本不宽裕的办学经费更加捉襟见肘。为筹措办学经费,《方案》强调了应进一步健全大学办学经费的成本分担机制;并提出大学应积极吸引社会捐赠,拓展筹资渠道。在财政经费日益紧张,学费标准难以较大提升的背景下,社会捐赠资金无疑成为大学创建双一流高校,解决办学经费缺口的重要渠道。

关于社会成本分担机制理论,最早是由美国著名教育家约翰·斯通提出的,他认为大学的各利益相关者,如政府、高校、学生与家长都应在其能力许可的范围内,共同承担高等教育成本^[1]。因此,如何利用好校友、家长和其他社会资源,对于高校解决经费困局起到了重要的作用。P. Bourdieu(1984)将社会资本定义为现实或潜在资源的集合体,它们与共同熟识和认可的关系网络有关^[2]。Stephen Knowles(2006)指出人们可以从社会网络中获取和使用社会资本,社会成本分担有助于提升高校的竞争力^[3]。Ingo Liefner(2003)认为,多元化的经费来源将有助于大学及教师的竞争意识的提升^[4]。王寰安等(2015)实证检验了大学绩效与政府拨款、学费和社会捐赠的关系,发现:政府拨款越多的大学,其绩效反而越差;大学排名与社会捐赠正相关,而与学费比率的关系却不显著^[5]。李锋亮和王云斌(2016)的研究发现,基金会的发展有助于提升大学的排名,它是大学与社会沟通的桥梁^[6]。这些研究充分说明有效的社会成本分担可以优化大学的经费结构,从而提升大学的办学绩效。

而随着我国“双一流”建设的实施与推进,高校办学经费的竞争将更趋激烈。而现实情况是,我国高校教育基金会发展迟缓,在“双一流”建设中的功能没有充分发挥,作用尚未充分彰显。刘春生和王任达(2005)、伍尚海(2010)、苏洋和赵文华(2016)、赵亮和胡仁东(2018)等学者的研究均发现我国大学募捐理

收稿日期: 2019 - 03 - 09

基金项目: 江西省教育规划项目“‘双一流’建设的社会成本分担机制研究”(18YB075)

作者简介: 潜力(1973 -),男,江西靖安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金融理论。

念落后、捐赠种类单一、投资不够专业、税收减免不足等是导致大学捐赠基金发展迟缓的重要原因^[7-10]。目前,我国大学经费构成中财政性经费和事业费收入所占比例仍然高达 90% 以上,过于依赖政府投入和学费收入,经费结构单一且缺乏稳定性。由于财政性经费面临政府公共预算的压力和限制,学费收入也受到家庭支付能力与教育公平的约束,在高等教育数量和质量需求不断提升的情况下,大学捐赠基金无疑是社会成本分担的一个重要突破口。但作为社会成本分担的主要经费来源之一,社会捐赠却发展缓慢,所占比例不足 2%。相较而言,美国大学社会筹资历史悠久,从殖民地时期哈佛学院的筹建开始,社会资本就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今社会捐赠是美国大学继政府拨款、学费之后的第三大经费来源。根据美国“全国教育数据中心”(NCES)的统计报告,2016 年美国私立大学捐赠基金和投资收益在其办学经费中所占比例为 23.7%,对美国公立大学的贡献也达到 14% 以上。由此可见,社会捐赠在我国大学中仍存在巨大的发展空间。

二、中美大学教育基金会对比

主要从捐赠体系、管理模式、资产规模、筹资结构、投资绩效和运营成本等维度,对中美两国高校教育基金会发展现状进行比较。

(一) 捐赠体系

美国高校社会捐赠历史悠久、体系完备,与捐赠主体间实现了需求互补与共赢发展。作为一个基督教国家,一直以来慈善捐赠在美国社会备受人们的推崇。美国第一所大学基金会是成立于 1925 年的哈佛大学基金会。而后,各个大学纷纷创立基金会,开始面向社会各阶层募集资金。高校基金会与社会经济、宗教传统、税收制度等外部环境要素有机整合,相互影响,演化形成了高校社会捐赠的良性循环体系。社会捐赠发展,大学的发展与捐赠者的社会地位提升形成一个正反馈机制。大学的社会捐赠并非是捐赠一方的无偿赠予,而是一种互依互惠、合作共赢的社会交换行为。高校从募捐者中获得资金,也必须积极为募捐主体提供相应的资源,满足他们的物质与精神需求,从而实现合作。

而我国高校的教育基金会尚处于发展初级阶段,与捐赠主体之间还未形成良好的反馈机制。一方面,我国高校绝大部分为政府出资的“官办”大学,办学经费的主要来源、甚至唯一来源为政府预算,尚未形成社会捐赠的传统。另一方面,受“财不外露”思想的影响,个人和企业对于社会捐赠的动力与热情还不高。虽然,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校友为母校慷慨捐赠,也有不少来自校友的巨额捐款,但总体而言,捐赠经费所占大学财政预算的比率还很低。并且,捐赠经费在使用上,也受到诸般限制,不能很好地满足大学经费使用的需求。另外,我国现有的税收体系对于个人或企业社会捐赠的税收抵减过低,这也严重限制了社会捐赠的发展。

(二) 管理模式

美国大学社会捐赠的管理专业化,多采用网络状组织结构管理方式,重视院系的作用。整个管理体系由募捐组织、募捐活动、资产管理等几部分构成。美国高校非常重视社会募捐,基金会通常采用校长负责制,并由副校长专职负责基金会的运作。针对不同的募捐形式,成立了相对应的捐款办公室,如团聚捐赠、计划捐赠、大规模捐赠、企业捐赠办公室。为使善款更好的保值、增值,美国高校均成立了独立运作的、高度市场化、专业化的基金会或管理公司来管理捐赠资金。基金董事会均由管理、市场和战略规划等方面的专家构成,同时聘请专职人员负责捐赠资金筹集、管理与运作。基金会为捐赠者提供了多种形式的捐赠方案,并根据捐赠者的需求和目的,帮助他们设计与选择合适的捐赠途径和捐赠项目。基金会具有完善的规章制度,对捐赠的接收、审核、估价、减税等程序都有严格的规定。以哈佛大学基金会为例,其捐赠机构的主要负责人是财政副校长,其捐赠管理部门下设发展办公室、财务部、风险管理和审核服务及审计办公室;而捐赠资金由哈佛管理公司(HMC)统一进行投资管理。完善的组织管理系统,保障了美国大学社会捐助事业的良性发展。

我国最早的大学基金会,是成立于 1992 年的“浙江树人大学暨王宽诚教育基金会”;而后,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于 1994 年成立,这开启了我国高校教育基金会发展的帷幕。根据基金会中心网的数据,截至 2017 年 12 月,高校教育基金会数量只占高校数量的 17.5%,仍有很多大学未成立捐赠基金会。但是,目前已有的大学基金会并未能充分利用其平台作用,进行有效的运营。我国高校的基金会多采用行政管理型模式。大部分高校基金会缺乏完备的组织构架,而将其功能分摊到了一些行政部门中去,处于一种代管状态;管理人员很少,也大部属于兼职的性质。我国大学基金会董事会成员一般是学校的行政领导与知名校友,少有来自

专业投资机构的金融人士。而且,大部分大学基金会隶属于校友会管理,只有很少学校成立专门的基金管理机构。基金会机构设置较简单,很少为不同的募捐形式单独设立办公室。同时,也缺乏院系的参与。另外,我国高校普遍缺乏专门的劝募机构,募捐人员专业化程度不高,多数未受过专门的劝募训练。基金会只能处理一般性的工作,比如与校友的联络。因此,基金会几乎成为一个虚设机构,根本谈不上机构的健全与持续发展,这使得基金会在校友与社会资源的利用上,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三) 资产规模

美国大学基金会的资产规模远大于中国大学。诚然,这与他们发展历史相关,更与美国大学对于社会捐赠的重视分不开。美国大学从校长到院长都非常重视募捐,募捐是他们最首要的工作。哈佛大学校长陆登庭在任期间,就创造了美国大学募捐的纪录。他六年任期间,筹集的款项高达26亿美元。据《2017美国教育年鉴摘要》显示,美国在册的854家大学基金会,其市场价值达5540亿美元,每家基金会平均6.49亿美元。其中:市值在1-5亿美元之间的基金会占比最高(有283家,占比33.1%);十亿以上的有102家;市值百亿美元以上的基金会只有8家,分别是: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普林斯顿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宾夕法尼亚大学、德州农工大学和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详见表1。美国大学捐赠基金在大学财政中的地位非常重要,美国私立大学的捐赠基金及投资收益通常占到学校财政支出的1/3,最高达到40%以上,如:耶鲁大学的捐赠基金收入一度占到财政经费的45.9%。即便是公立大学,捐赠收入也占学校经费来源的10%左右。充足的经费促进了大学的教学、科研水平的提高。同时,也提高了大学财政的独立性,有利于世界一流大学现代大学制度的建设,也为学校发展的代际公平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与美国相比,我国高校的社会捐赠尚处于初级阶段,其占教育成本分担中的比例还很低。近年来,随着我国大学办学经费来源渠道从一元走向多元,非财政性教育经费所占的比重逐年提升。根据2017年《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高等院校办学经费中的社会捐赠收入的占比仅为0.61%。即便是获得社会捐赠收入最多的清华大学,其社会捐赠收入占比也不足3%。根据基金会中心网的数据,2017年我国高校基金会规模超过10亿的只有6家,分别是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京大学和厦门大学,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同时也可看到,我国大学的教育基金会虽然成立时间较短,规模较小,但是发展速度很快。通过表1的对比,美国前十大高校基金会的资产规模远大于中国高校,美国高校的捐赠基金对于大学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重要。部分私立大学的办学费用中30%-40%来源于社会捐赠,而我国高校办学经费中社会捐赠占比不到1%。因此,我国高校的社会捐赠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图1呈现了中国前三大高校(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2013-2017年的收支情况,从图中可知: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基金会的净资产年均增加,近乎达到20%,而北大基金会的净资产增长也达到了年均12%。在捐赠收入上,清华大学较为稳定,而浙江大学的增长较快。

表1 2017年中、美大学捐赠基金市值排名前十位的资产比较

美国大学	捐赠基金市值(\$)	中国大学	捐赠基金市值(元)
1 哈佛大学	37 096 474 000	清华大学	7 279 880 000
2 耶鲁大学	27 216 639 000	北京大学	4 801 500 000
3 斯坦福大学	24 784 943 000	浙江大学	2 798 640 000
4 普林斯顿大学	23 353 200 000	上海交通大学	1 269 920 000
5 麻省理工大学	14 832 483 000	南京大学	1 133 740 000
6 宾夕法尼亚大学	12 213 207 000	厦门大学	1 026 520 000
7 德州农工大学	10 808 501 077	中国人民大学	736 340 000
8 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	10 777 563 000	复旦大学	705 740 000
9 哥伦比亚大学	9 996 596 000	北京师范大学	662 040 000
10 圣母大学	9 684 936 000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639 030 000

资料来源:美国大学捐赠基金数据来自 www.cae.org 收集整理,中国大学捐赠基金数据根据基金会中心网整理而得

(四) 筹资结构

美国高校基金会的捐赠主体包含:校友、非校友的个人、公司、基金会和其他机构等五大类。其他机构主要有宗教性组织和募捐协会等机构。根据美国教育发展与资助委员(CASE)公布的2018年美国高等教育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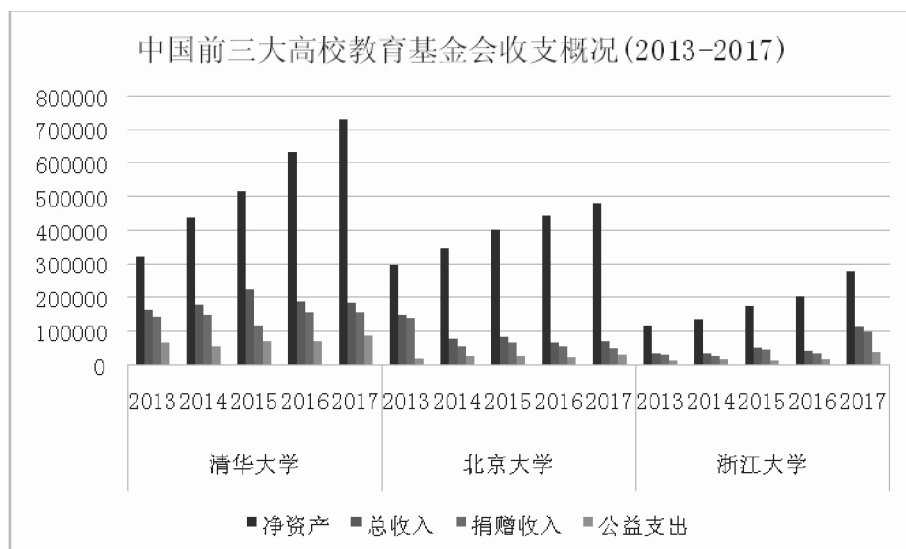


图1 中国前三大高校教育基金会收支概况图(2013 - 2017 年)

资料来源: 基金会中心网

赠数据,当年美国大学捐赠收入为467.3亿美元。从下图2可知,2018年美国大学社会捐赠构成所示:校友捐赠占26%,非校友捐赠为18.3%,公司捐赠占比14.4%,基金会捐赠为30%,而其他机构捐赠占11.3%。由此可见,美国大学基金会具有丰富的融资渠道,各渠道融资比率相对均匀,这保证了基金会的捐赠收入比较稳定及有持续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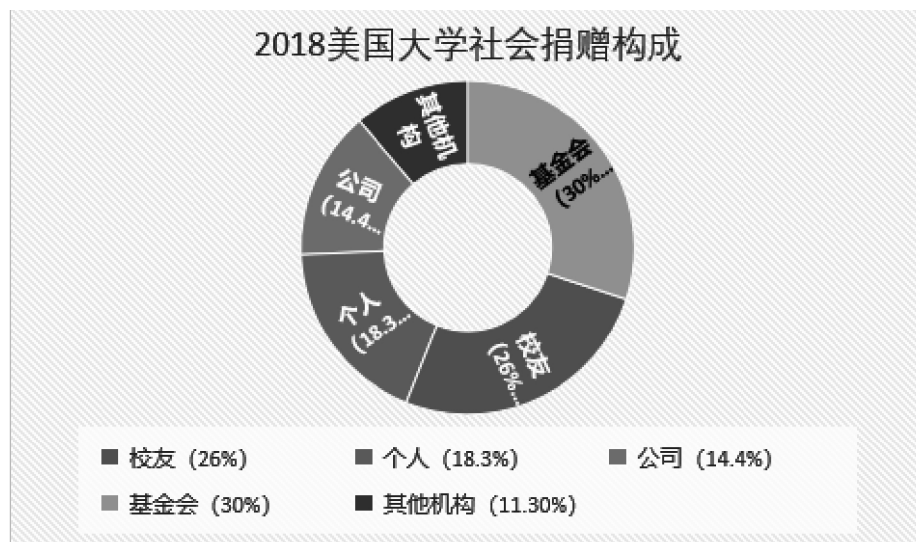


图2 2018年美国大学社会捐赠构成

资料来源: 美国教育发展与资助委员(CASE) 2018年高等学校自愿捐赠调查

美国大学基金会的捐款形式非常灵活,包含现金、非现金和延后捐赠三种类型。除现金外,捐赠者可以采用指不动产、有形资产、信托、证券等多种非现金方式进行捐赠。另外,捐赠人购买所购买的各类养老保险,如养老年金信托、慈善剩余信托等,可以捐出其中的部分受益金,作为延后捐赠给大学的基金会。相较而言,我国大学教育基金会的募捐形式比较单一,主要接受现金和实物捐赠,很少采用信托和延后捐赠的形式。

美国大学重视募捐运动。募捐运动不同于募捐行动,其具有明确的募捐主题和长期的募捐计划。如密西根大学2004-2008年的“卓越密歇根”大宗筹款运动,筹款目标25亿美元,实际筹款32亿美元。而我国大学的募捐相对缺乏长期的募捐计划,而更多是短期的募捐活动,例如:利用校庆等特殊纪念日,向校友展开筹款活动。

我国高校教育基金会的收入来源可分为:捐赠收入、投资收入、服务收入、政府补助收入和其他收入。

根据表2,从2017年度收入前十高校基金会的收入构成情况来看,我国高校教育基金会主要依靠捐赠收入,捐赠收入平均占80%以上,投资收入占比不高,平均在15-20%之间,而其他收入很低。高校教育基金会应该拓展融资渠道,发挥高校的自身优势,增强自我发展能力,摆脱严重依赖外部“输血”的状况,进一步优化自身的筹资结构。

表2 2017年中国大学高校教育基金会收入前十位的收入构成

名称	收入总计(元)	捐赠收入(元)	占比(%)	投资收入(元)	占比(%)	其他收入(元)	占比(%)
1 清华大学	1 880 207 250	1 564 153 167	83.2%	314 659 099	16.7%	1 394 984	0.1%
2 北京大学	700 430 155	518 850 317	74.1%	179 259 255	25.6%	2 320 583	0.3%
3 浙江大学	1 140 071 285	1 013 445 954	88.9%	125 792 726	11.0%	832 604	0.1%
4 上海交通大学	339 270 000	238 850 000	70.4%	88 545 550	26.1%	11 874 450	3.5%
5 南京大学	155 659 903	102 918 010	66.1%	46 992 359	30.2%	5 729 532	3.7%
6 厦门大学	284 450 000	261 940 000	92.1%	22 346 000	7.9%	164 000	0.1%
7 中国人民大学	230 597 000	203 539 900	88.3%	22 980 500	10.0%	4 077 500	1.8%
8 复旦大学	270 638 655	251 271 907	92.8%	15 933 457	5.9%	3 433 291	1.3%
9 北京师范大学	193 000 000	145 000 000	75.1%	36 200 000	18.8%	11 800 000	6.1%
10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105 590 000	88 550 000	83.9%	15 879 000	15.0%	1 161 000	1.1%

资料来源:根据2017基金会中心网的数据整理而得

(五) 投资绩效

表3和表4对比了2017年度中美顶尖大学教育基金会的规模和投资收益以及投资组合。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美国大学不仅在投资收益上远大于中国大学(11.54%:4.06%),而且投资组合构建上也要比中国大学丰富的多。美国大学基金会的投资组合呈现了丰富的多元化投资特征,投资标的包含:国内外股票、债券、私募股权、不动产、商品期货、自然资源等非常丰富的投资选择。这也是美国大学基金会一直以来既能保持较高收益率,又很稳定的原因。当然,这也与他们成立专门的大学基金管理公司,聘用资深的理财经理,进行专业化打理分不开的。佟婧和燕凌(2012)研究发现:耶鲁大学基金会在2003-2012年,十年的年均复合收益率为11.9%,提供了耶鲁大学财政预算的35%左右,被学界称为“耶鲁奇迹”^[11]。它的投资组合非常丰富,包含国内外股票、固定收益债券、绝对收益基金、私募股权、自然资源和不动产等。美国大学基金会的投资组合通常包含三部分,传统资产(国内外股票、债券)、私募股权和实物资产(包括:自然资源和不动产)各占三分之一,这既保证了其投资选择的丰富性,也使得其能取得优异且稳定业绩。另外,美国的教育基金是免税的,这也是它们取得较高收益的重要原因。

反观我国大学基金会的资产配置,投资标的比较单一,投资风格保守,主要投资于风险很小的银行存款或债券,只有很少一部分资金投资于股票等高收益资产。另外,也没有投资自然资源、不动产、商品期货等新型高收益投资工具,收益率很低。这是因为,我国高校教育基金会保本是第一要务,高校基金会缺乏专门的投资团队,税收上也缺乏相应的税收激励。

表3 2017年中美十大高校基金会规模与投资收益率对比

		基金会规模(单位:美国大学: \$ 亿元,中国大学:¥ 亿元)	投资收益率(%)
美国大学	均值	180.76	11.54
	标准差	94.57	4.83
	中位数	135.2	11.23
中国大学	均值	21.05	4.06
	标准差	22.46	2.04
	中位数	10.80	3.72

表 4 2017 年中美顶尖大学教育基金资产组合及收益率对比

中美大学教育基金资产组合		收益率
美国大学		
1 耶鲁大学	绝对收益(17.8%)、国内股票(5.9%)、固定收益产品(4.9%)、国外股票(9.8%)、私募股权(32.0%)、不动产(20.2%)、自然资源(7.9%)、现金(1.5%)	13.87%
2 哈佛大学	国内股票(11%)、国外股票(11%)、私募股权(11%)、公共商品(1%)、自然资源(11%)、不动产(12%)、绝对收益(16%)、固定收益债券(10%)	12.46%
3 斯坦福大学	公募权益证券(25%)、私募权益证券(23%)、绝对收益(22%)、自然资源(12%)、不动产(8%)、固定收益债券(10%)	12.02%
4 普林斯顿大学	固定收益和现金(5%)、国内权益证券(8%)、国外发达市场证券(6%)、私募权益证券(23%)、不动产(23%)、国外新兴市场证券(11%)、独立收益(24%)	11.25%
中国大学		
1 清华大学	银行间拆借市场、企业债券、央行票据、金融债、国债及国债回购、开放式基金等组合投资	4.98%
2 北京大学	银行存款、国债、企业债券、股票市场投资	3.23%
3 浙江大学	银行存款、金融债、企业债券、央行票据、基金	3.41%
4 南京大学	银行存款、股票、债券	3.55%

(六) 运营成本

美国高校基金会大都成立专门的资产管理公司,并独立经营。其基金管理者的收入与基金投资绩效直接挂钩,基金经理享有很高的收入。例如:耶鲁大学的史文森,因其卓越的投资绩效,他的收入远高于耶鲁大学校长。

而我国高校教育基金会长期保持着低成本状况,根据 2017 年基金会中心网的数据,各高校基金会的管理费用支出占总成本的不超过 1.5%。以清华大学为例,2015—2017 年间,管理费用只占总支出的 1.6%。这是因为我国高校的教育基金会往往与学校校友会或相关组织合署办公,绝大部分工作人员属于兼职,他们的工资由学校办公经费中支出,并不占用基金会的费用,从而导致了“低成本”、甚至“零成本”的出现。但这种低投入,也导致了基金会工作人员缺乏必要的激励机制,影响基金会的募捐和投资。

三、启示与借鉴

(一) 大学基金会发展与“双一流”建设相辅相成

美国高校的建立与发展,以及当今享誉世界的教学质量、科研水平,均离不开社会捐赠的大力支持。我国的大学教育基金会也正逐步成为筹措大学办学经费的重要渠道。基金会应努力发挥社会成本共担机制,最大限度地挖掘社会资源,为创“双一流”大学贡献力量。大学捐赠基金规模越大,越有利于提升大学的生源质量、师资力量与科研能力,而这些均为“双一流大学”建设的主要指标。从中、美大学的数据来看,大学捐赠基金规模与大学的排名紧密相关,一流大学的捐赠基金总量显著高于普通大学。大学层次越高,其基金会的发展越优异;越有益于大学获得更多捐赠,从而促进其大学排名的提升;因此,这两者间形成一个良性的互动。

(二) 找寻与捐赠主体的利益共同点,建立长效的募捐激励机制

大学的募捐,绝非是单纯的索取,而是与社会捐赠主体之间建立互依互惠、合作共赢的关系。高校利用校友情结进行募捐,校友则通过高校的资源共享,为其自身发展和子女就学提供便利。首先,高校应及时向捐赠主体反馈捐赠基金的运作与使用状况。其次,要用心呵护与捐赠者,或潜在捐赠者的友好关系。当校友患有严重疾病,或者家庭出现很大财政困难时,基金会应该主动给予帮助。还有,要与捐赠主体建立合作共赢的关系。捐赠者为大学发展捐赠基金,而大学可以从科研与人才培养上为捐赠者助力。借助大学强大的科研平台,可以为捐赠者公司提供科研支持。同时,还可以为这些公司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供应。

(三) 完善基金会组织结构,提高管理人员的专业化水平

我国大学基金会应提升基金会筹资专业化、运营精细化水平,并开发多种筹资模式。第一,应该逐步完善董事会的构成,引入更多的专业人才进入董事会。并且,面向不同的捐款对象,设定专门的募捐机构。第

二 构建校、院两级募捐体系。校友与学生家长对于学校的第一认知就是学院,通过学院分专业、分年级的校友联合会,可以将校友联络与募捐活动更紧密地联系起来,提升募集效率。第三,加强基金会募捐人员的专业培训。募捐人员应该具备营销学、心理学、教育学等多方面的知识。基金会应优先录取上述专业知识的人员,并对现有人员进行这方面的长期培训。第四,设立专门的资产管理机构或者委托专业的资产管理公司来负责基金的投资运作,将募集资金进行有效的投资,以获取较高且稳定的投资收益,实现基金的保值与增值。

(四) 加大筹资力度,创新募捐模式

第一,借鉴美国经验,我国的大学也可以将筹款活动转变为筹款运动,重视募捐计划的前瞻性与长期性。应根据学校发展的实际需要,制定3-5年并有明确主题的募集运动。如为吸引优秀师资而成立专门的“讲席教授”筹款运动,为学校的双一流建设的人才争夺战储备资金。其次,募集活动要有针对性。要针对捐赠者,或者潜在捐赠者的意愿,推出不同的募捐计划,改变过去“产品导向”的被动募捐理念。第二,高校基金会应更加重视利用新媒体,进行小额捐赠。从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中特朗普团队的募捐策略中发现:虽然特朗普团队的募集金额低于希拉里团队,但是他们采用Twitter等自媒体来筹款,重视小额募捐,有超过98%的资金是200美元或更少的小额捐款。从选举结果来看,自媒体的影响力要显著好于传统媒体。因此,大学基金会不妨借鉴特朗普团队的募捐策略,采用新媒体来开展募捐活动,如利用“水滴筹”等募捐方式来吸引小额捐款;同时达到提升大学知名度。所有,应鼓励基金会通过网络和自媒体渠道来募捐,开发新的募捐APP,以改变目前高校募捐的“马太效应”。因此,我国高校基金会应调整募捐思路,更加重视小额捐赠。同时利用新媒体工具,创新筹款途径;尝试发起互联网募捐、竞赛型募捐等。

(五) 丰富投资渠道,使基金保值增值

相对而言,我国大学基金会的投资运作能力还相对薄弱,其资产配置则单一且保守。从表4可以看到,2017年美国顶尖高校基金的投资收益均在10%以上,而我国顶尖高校基金的收益只有3.5%左右。诚然,根据我国慈善机构管理规定,慈善基金保本是第一要务。这就使得我国大学基金会绝大部分资金投资于风险极小、但收益很低的固定收益类资产(包括定期储蓄和货币市场基金和固定收益债券),导致其达不到基金增值的目标。同时,由于我国资本市场尚处于发展阶段,创新类产品不足,同时也缺乏完备的风险对冲工具。这也是导致我国大学基金会投资产品单一、收益低下的重要原因。借鉴美国的投资经验,我国大学基金会应该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进一步丰富投资组合的选择,在风险可控前提下,提升和稳定长期收益与规模。

(六) 政府应在税收和立法上给予大学基金会更多的支持

为鼓励教育捐赠,在美国的税收立法中,对各种捐赠行为有详尽的优惠细则,旨在通过收入效应和价格效应来影响捐赠主体的收入,从而对社会捐赠产生激励作用。个人和公司的教育捐款没有额度的限制。个人的现金捐赠可享有50%的税前扣除;而个人遗产捐赠,则有100%的税前扣除。公司捐赠可获得15%的税前抵扣。这些税收优惠,极大刺激了社会财富的公益化导向。另外,美国国会先后制定了《统一普通信托基金法》《美国慈善捐赠法》等法律大力推动大学基金会的发展,确保了大学基金会从成立到运行,都做到有法可依。

相对于美国较为完善的法律体系和税收政策,我国现行法律对于捐赠的税收优惠幅度小,对社会捐赠行为并未起到很好的激励作用。为改变现状,有必要进一步加大社会捐赠的税收优惠力度,引导社会资金的公益化倾向。目前政府在税收立法上已做了相应调整,2017年的企业所得税法修正草案将企业的公益性捐赠支出,超过年度利润总额12%的部分,准予结转以后三年内扣除;但还需要在以下方面进一步优化,如:允许实物捐赠免税,简化捐赠扣税程序等。

四、结论

大学的“双一流”建设,离不开经费的保障。根据社会成本共担的思想,本着“谁受益,谁出资”的原则,大学捐赠将成为解决办学经费的重要途径。美国的大学基金会成立最早,有着丰富的募款经验,并已形成良好的捐赠与管理体系。而我国大学的基金会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规模小,募集管理体系不完善。通过学习

美国的经验,我国大学基金会需不断完善捐赠体系,建立长效募捐激励机制,提升管理人员的专业化水平,创新募捐模式,丰富投资渠道,从而更好地助力高校的“双一流”建设。

参考文献:

- [1] DB. 约翰·斯通. 高等教育财政: 问题与出路 [M]. 沈红 译.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4: 18 - 20.
- [2] P. Bourdieu.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ment of taste [M].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 [3] Stephen Knowles. Is social capital part of the institutions continuum and is it a deep determinant of development? [J]. UNU - WIDER Research Paper 2006(25): 25 - 26.
- [4] Ingo Liefner. Funding,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Performance in Higher Education Systems [J]. Higher Education 2003 (4): 28 - 30.
- [5] 王震安, 宁晔, 王琰. 大学筹资结构对办学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以美国全国性大学为例 [J]. 教育与经济 2015 (2): 44 - 56.
- [6] 李锋亮, 王云斌. 教育基金会的发展与世界一流大学建设 [J]. 复旦教育论坛 2016 (3): 19 - 25.
- [7] 刘春生, 王任达. 发展大学捐赠基金会, 促进大学教育捐赠 [J]. 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 (21): 4: 8 - 11.
- [8] 伍尚海. 高等教育基金会的发展探析 [J]. 高教论坛 2010(8): 128 - 129.
- [9] 苏洋, 赵文华. 中美一流大学教育基金会的比较与借鉴 [J]. 高教探索 2016(3): 53 - 57 + 74.
- [10] 赵亮, 胡仁东. “双一流”建设背景下我国高校教育基金会发展的策略选择 [J]. 重庆高教研究 2018 (11): 72 - 85.
- [11] 佟婧, 燕凌, 洪成文. 耶鲁大学捐赠基金成功运作之道 [J]. 高教探索 2012(3): 47 - 51.

A Study on the Social Cost Sharing of Universities under the Construction of “Double First - Class”

——Comparisons between Chinese and American University Education Foundations

QIAN Li

(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Nanchang, Jiangxi 330013, China)

Abstract: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insufficient funds for running higher education, we need to share social costs. This paper comparing the donation system, management mode, asset scale, financing structure, investment performance and operation cost of Chinese and American university education foundations, it is found that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in China's university education foundations, such as imperfect system, unprofessional management, small asset scale, unreasonable financing structure, weak investment performance, low cost input and insufficient tax incentives. All these have seriously hindered the release of endogenous motiv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foundations and restrained their supporting rol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Double First - Clas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learn from the advanced experience of the top universi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ombining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to improve the management system of China's university education foundation. We will establish a long-term donation incentive mechanism, improve the professional level of management personnel, innovate the donation mode, and improve the performance of fund investment, so as to better facilitate the construction of “double first - class” universities.

Key words “Double First - Class” construction; Social Cost sharing; University education foundation; Investment and financing strategies

(责任编辑: 沈 五)